

第三章 双坟土墩墓与大浪汉城址的时空关系研究

第一节 双坟墩土墩墓的发掘

双坟墩位于合浦县城东北约 12 公里的石湾镇大浪村红花坎村民小组北侧，南距大浪古城约 700 米。南流江在双坟墩以北 1.4 公里处分出一支流经其西面，过县城称西门江，再往南约 10 公里注入北部湾（图 3-1）。双坟墩为两墩，地处红土台地，大致呈东西向排列，相距 41 米。东侧墩编号 D1，西侧墩编号 D2。D2 地理坐标为东经 $109^{\circ} 16' 4.35''$ ，北纬 $21^{\circ} 45' 17.27''$ ，墩顶海拔高度为 12.6 米。

2004 年 11 月，广西文物工作队（“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前身）曾对 D1 进行过清理，但由于当时误为汉墓封土堆，操作方法失当，未能判明为土墩墓，仅发现遗物一批。2012 年 6~9 月，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对 D2 进行发掘，布 5 米×5 米探方 18 个，发掘面积 450 平方米。本简报主要对象为 D2，D1 发现遗物也一并报告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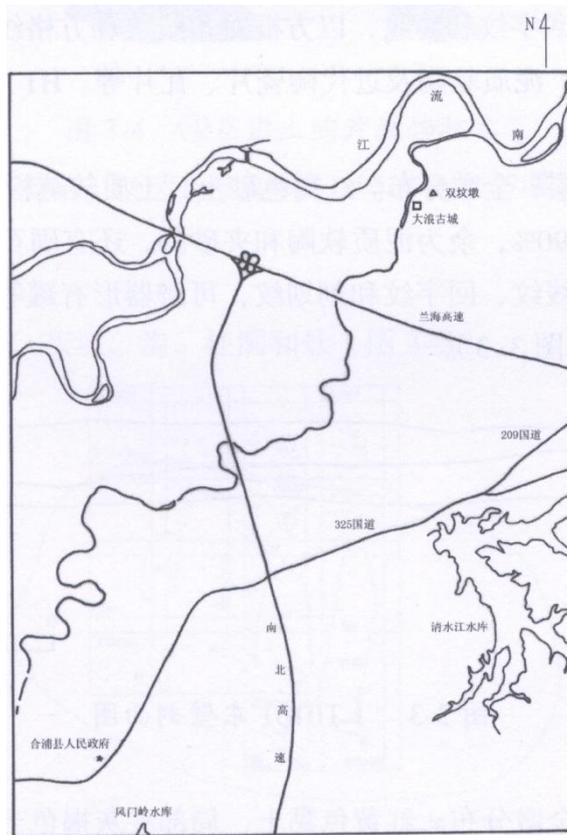


图 3-1 双坟墩地理位置示意图

一、D2 地层堆积及包含物

D2 外观呈馒头状，平面为椭圆形，南北径 21、东西径 35、中部残高 1.6 米。地表原有密集的灌木和乔木，墩体北部遭现代坟破坏。依土质、土色和包含物不同，D2 的堆积可分五层（图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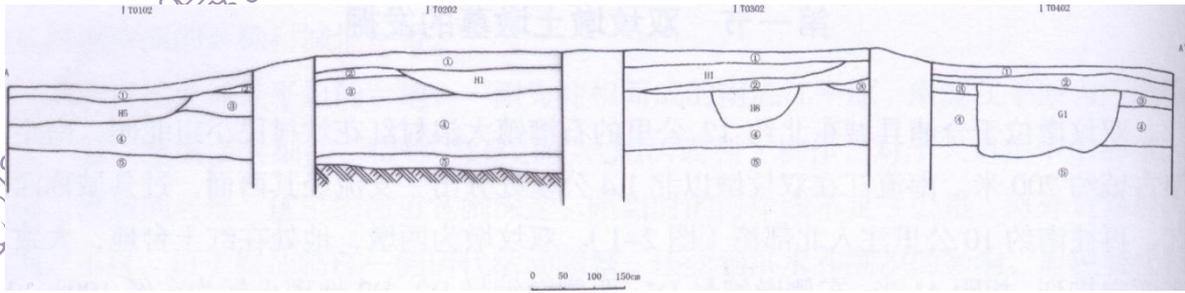


图 3-2 D2 东西向剖面图

第①层：表土层，全墩分布。灰褐色砂土，土质疏松，厚 0.14~0.26 米。包含物较多，几何印纹硬陶超过一半。印纹硬陶有灰褐色和红色两种，饰方格纹、复线菱格纹、

方框对角线纹、席纹、回字纹和夔纹，以方框对角线纹和方格纹居多，可辨器形有罐、钵、碗等，余为夹砂陶、泥质软陶及近代陶瓷片、瓦片等。H1、H3~H5 和 Z1 叠压于此层下。

第②层：近代扰乱层，全墩分布。红褐色砂土，土质较疏松，最厚 0.35 米。包含陶片较①层少，硬陶约占 90%，余为泥质软陶和夹砂陶，还有砾石、近代板瓦等。陶片纹饰有方格纹、方框对角线纹、回字纹和刻划纹，可辨器形有罐等。G1、H2、H6~H8 与 M1~M4 叠压于此层下（图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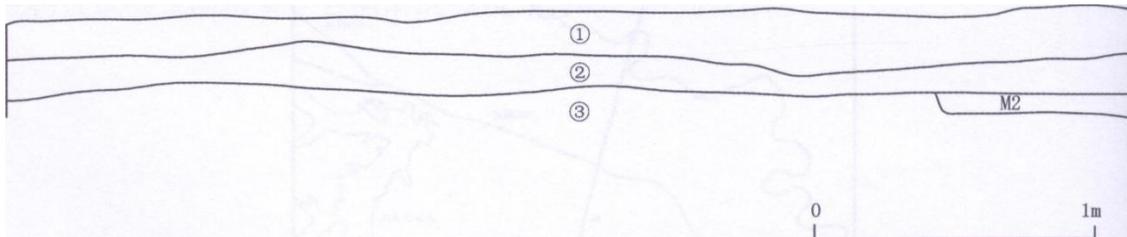


图 3-3 I T0101 东壁剖面图

第③层：垫土层，全墩分布。红黄色黏土，局部夹灰褐色土，土质致密，最厚 0.4 米。无包含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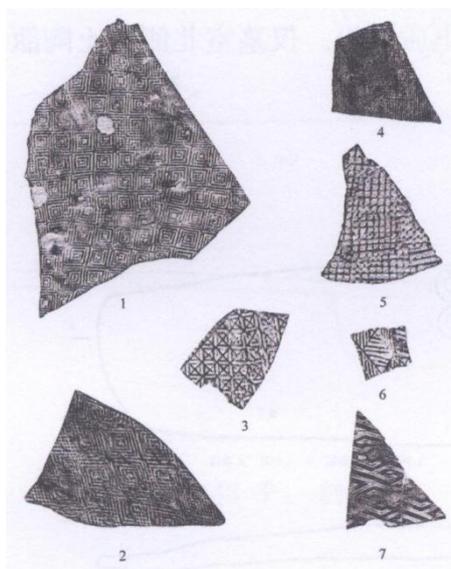


图 3-4 ④层出土陶片纹饰拓本
1. “回”字纹 2. 复线菱格纹 3. 6. 方框对角线纹 4. 5. 方格纹 7. 夔纹

第④层：垫土层，近水平堆积，全墩分布。红色夹灰、黄色黏土，土质致密，厚0.36~1.05米。出土陶片数量与②层相当，绝大多数为硬陶，少量为红色软陶。纹饰有复线菱格纹、夔纹、方框对角线纹、回字纹和方格纹等（图3-4，④层出土陶片纹饰拓本）。可辨器物有陶釜、陶罐和砺石等。H9~H11、G2及ZD1~ZD112叠压于此层下。

第⑤层：位于墩体中部及北部，表面平整，应为④层下建筑的垫土层。深灰褐色土，厚0.15~0.3米。未发现包含物。ZD113~ZD119叠压于此层下。

⑤层以下为生土。

二、D2 遗迹

D2发现遗迹有墓葬、灰坑、沟、柱洞和灶（图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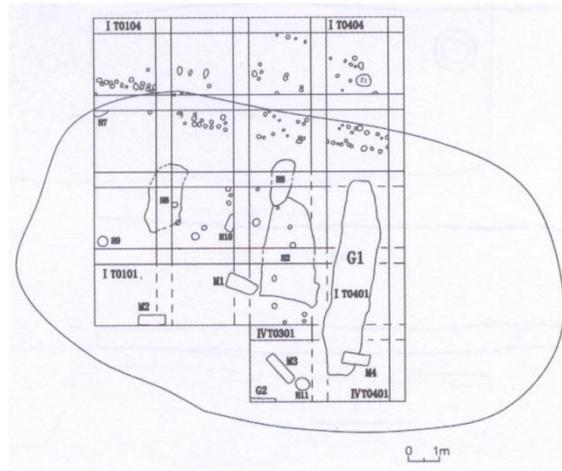


图 3-5 D2 遗迹分布图

（一）墓葬

4座，分布于土墩中部和东南部。叠压于②层下，打破③层。1座为晚期扰乱墓葬，编号M1。3座为熟土土坑墓(M2~4)，葬具和人骨全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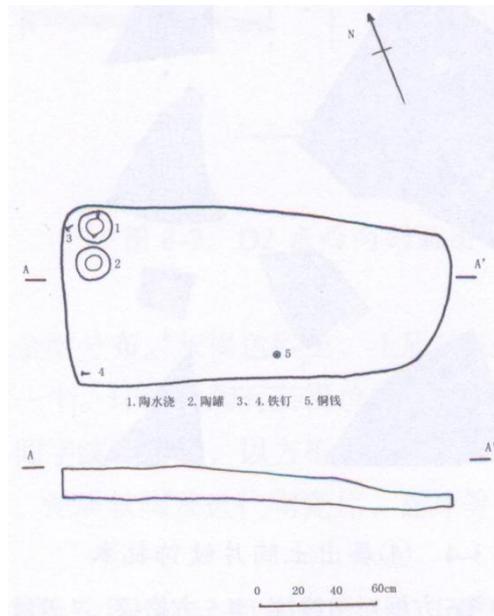


图 3-6 M1 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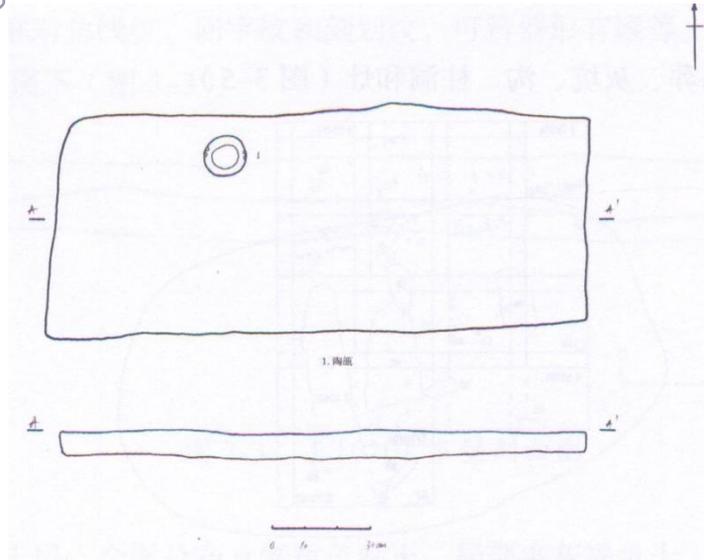


图 3-7 M2 平、剖面图

M1 位于 I T0201 和 I T0301 内，东西向。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长 2、宽 0.74~0.94、残深 0.16 米。墓内填土为深灰色黏土，土质疏松。随葬器物分布于墓室一端，有陶罐 2 件、铁棺钉 2 件，“熙宁通宝”和“大观通宝”各 1 枚（图 3-6）。

M2 位于 I T0101 东南角，正东西向。平面呈长方形，长 1.7、宽 0.7、残深 0.16 米。墓内填土为灰色黏土，土质疏松。仅墓室北侧出土陶甑 1 件（图 3-7）。

M3 位于 IVT0301 中部，西北东南向。平面呈长方形，长 2.15、宽 0.57~0.62、残深 0.06 米。墓内填土为黑灰色黏土，夹杂少量炭屑，土质较疏松。墓室一端出土陶杯 6 件、瓮 1 件。陶瓮所处的位置深挖圆坑，置入器物填实后，于一旁再摆放陶杯，瓮与杯的上部基本持平（图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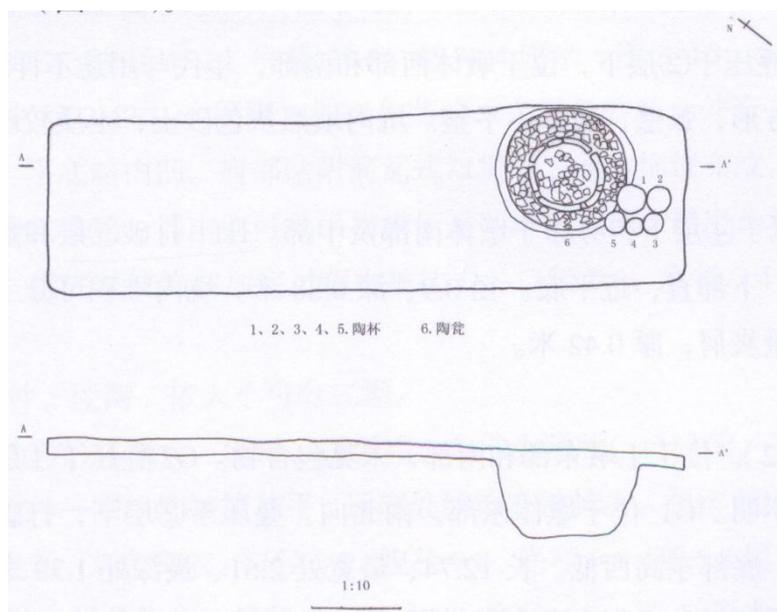


图 3-8 M3 平、剖面图

M4 位于 IVT0401 北部，大体为东西向。平面呈长方形，长 1.75、宽 0.7、残深 0.07

米。墓内填土为灰黄、灰色黏土，土质较疏松。墓室一端出土陶杯5件、瓮1件。陶瓮埋藏及器物摆放方式与M3类似（图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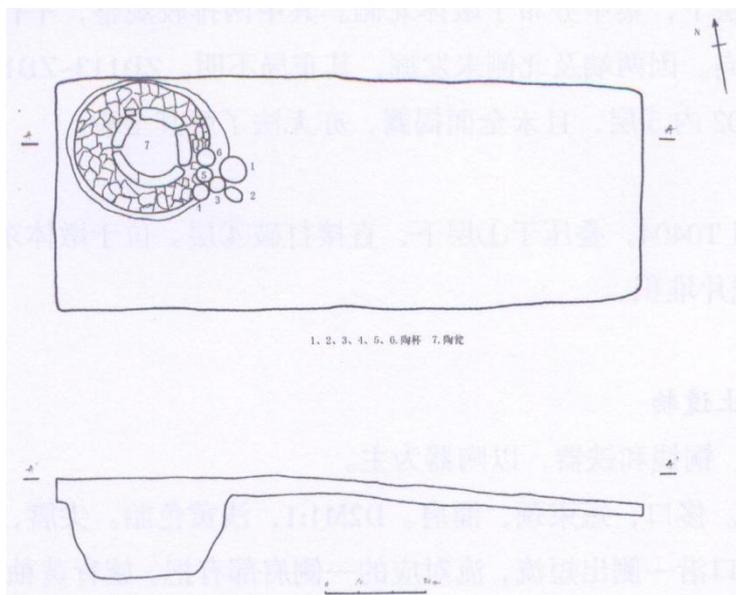


图3-9 M4平、剖面图

（二）灰坑

11个，均未发现包含物。

H1、H3~H5 叠压于①层下，分布于墩体中部及西北部。坑内填疏松的灰黑色砂土，为近现代扰坑。

H2、H~H8 叠压于②层下，位于墩体西部和南部，年代与用途不详。H2 打破③、④层，平面呈长方形，弧壁，底部不平整。坑内填黑灰色砂土，土质较疏松，夹杂少量红烧土和炭屑。

H9~H11 叠压于④层下，分布于墩体南部及中部。H11 打破⑤层和生土，平面近圆形，壁上部弧收，下部直，近平底。径0.9、深0.88米。坑内堆积可分三层，底层为灰黑色土，夹杂少量炭屑，厚0.42米。

（三）沟

2条(G1、G2)，位于土墩东部和南部，未见包含物。G2 叠压于④层下，仅部分进行了发掘，形制不明。G1 位于墩体东部，南北向。叠压于②层下，打破③、④层，平面为不规则条状，底部东高西低。长12.74、最宽处2.61、最深处1.39米。沟内填土为黑灰色黏土，土质疏松，底部夹杂少量炭屑。

（四）柱洞

共139个，编号ZD1~ZD139。位于墩体中部及北部。柱洞开口层面较平坦，形制相似，平面呈圆形或椭圆形，直壁或斜直壁，多为平底，也有少部分为尖底。大小、深度不同，直径0.1~0.36、深0.06~0.52米。洞内填土为灰红色或灰褐色黏土，土质较疏松。ZD1~ZD112

叠压于④层下，集中分布于墩体北侧。其中两排较规整，平行分布，间距1.1米，略呈西北东南向。因两端及北侧未发掘，其布局不明。ZD113~ZD119开口⑤层下，由于仅发掘IT0202内⑤层，且未全面揭露，亦无法了解其全貌。

(五) 灶

1处(Z1)。位于IT0404，叠压于①层下，直接打破④层。位于墩体东北角，灶内有大量红烧土和陶釜残片堆积。

三、D2 出土遗物

(一) D2 墓葬出土遗物

共20件。有陶器、铜钱和铁器，以陶器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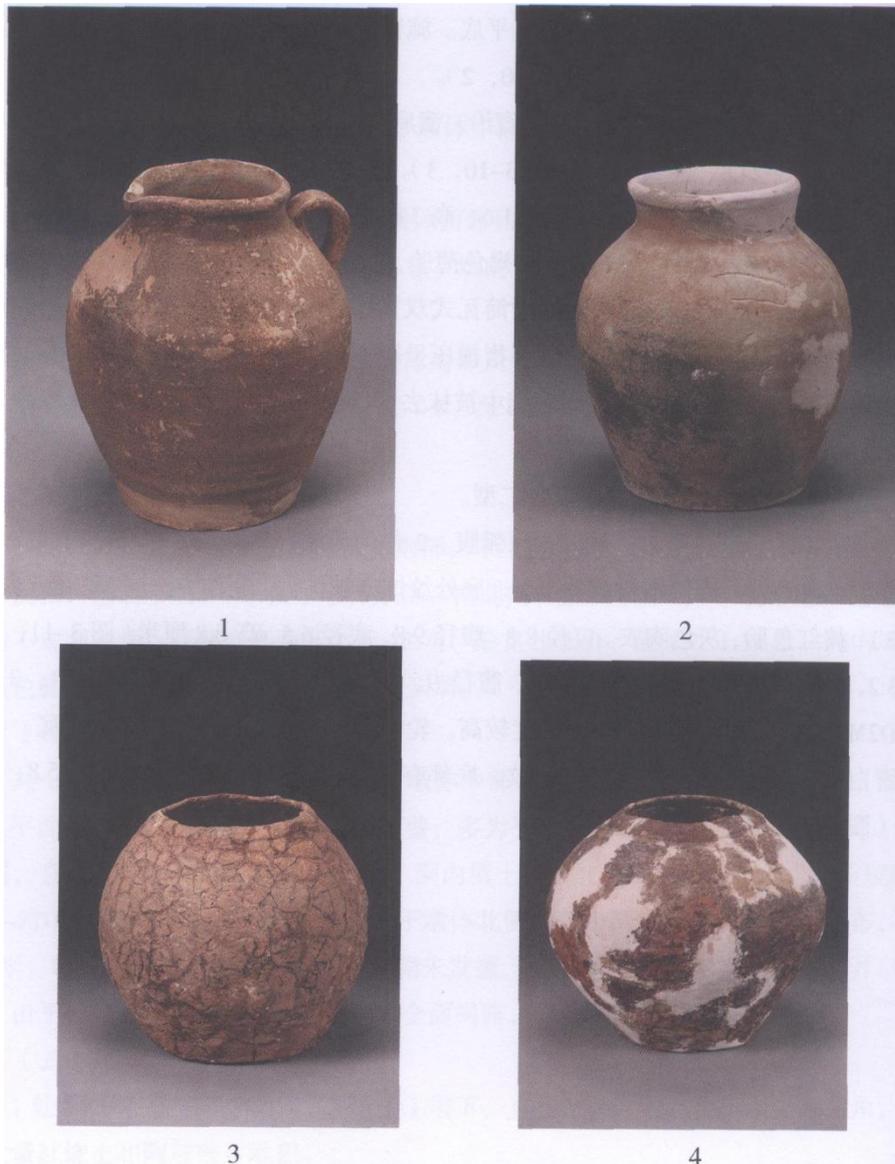


图 3-10 D2 出土陶器

1. 带把短流陶罐(D2M1:2) 2. 陶罐(D2M1:1) 3. 陶瓮(D2M3:6) 4. 陶瓮(D2M4:7)

陶罐2件。硬陶。侈口，短束颈，溜肩。D2M1:1，浅黄色胎。尖唇，上腹鼓，下腹斜

直，平底略内凹。口沿一侧出短流，流对应的一侧肩部有把。施青黄釉，部分脱落。器内外可见泥条盘筑痕迹。口径7、底径9.4、高16.8厘米(图3-10,1)。D2M1:2，灰白胎，圆唇，鼓腹，最大腹径靠上，平底。施青釉，多已脱落。罐内有铜钱1枚。口径8.8、底径10.5、高16.6厘米(图3-10,2)。

陶瓮2件。泥黄色软陶。敛口，宽沿，溜肩。D2M3:6，圆鼓腹，平底。口径20.8、腹径39.6、底径24.8、高34厘米(图3-10,3)。D2M4:7，鼓腹，下腹斜直内收，平底略内凹。口径17.2、腹径43.2、底径21.6、高34.4厘米(图3-10,4)。

B型：8件，形体较小。灰白胎，外有乳白色陶衣。轮制。敞口，斜直腹，平底。器内外施青黄釉，多已脱落。下腹近底处旋刮一周，底部有螺旋式切割痕。D2M3:5，口径7.2、底径3.6、高5.4厘米(图3-11,5)。D2M4:2，略有小台足，口径6.2、底径3.2、高5.2厘米(图3-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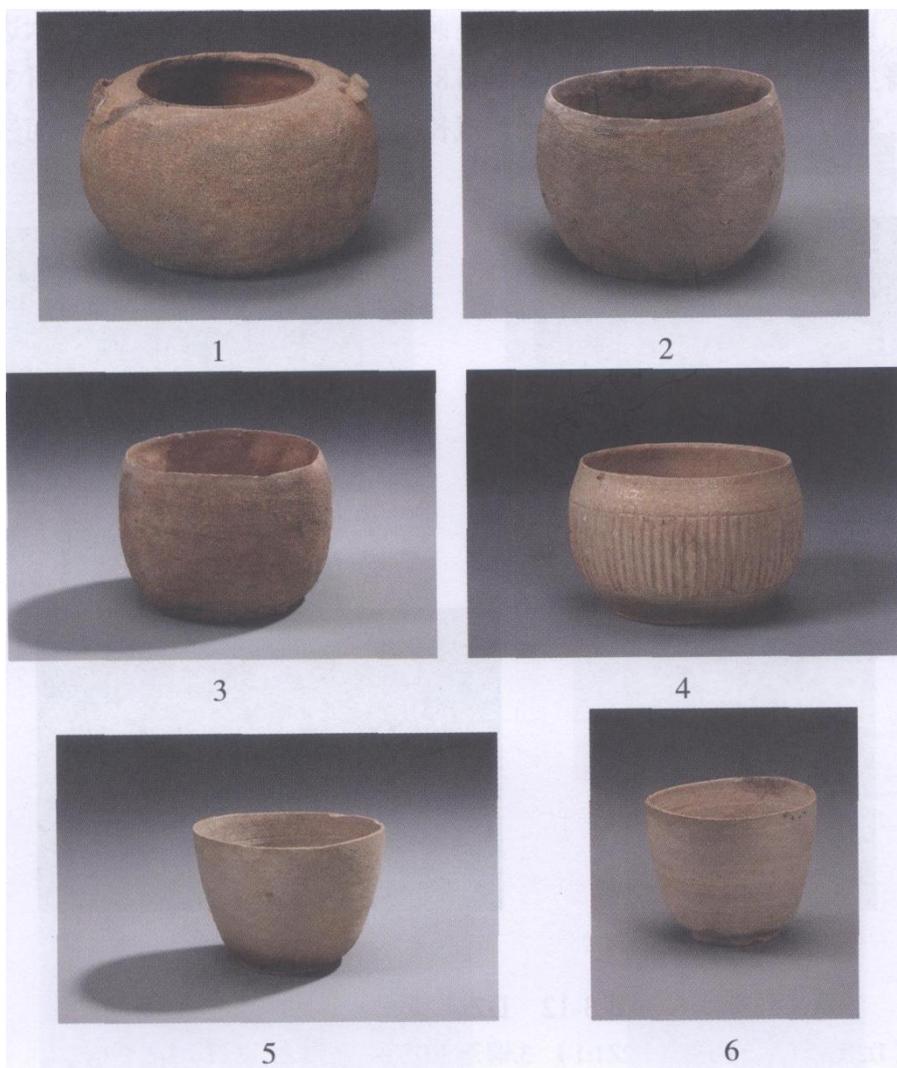


图3-11 D2出土陶器

1. 陶甗(D2M2:1) 2. A型I式陶杯(D2M3:1) 3. A型I式陶杯(D2M3:2)
4. A型II式陶杯(D2M4:1) 5. B型陶杯(D2M3:5) 6. B型陶杯(D2M4:2)

铜钱 2枚。锈蚀严重，呈绿色，泛白。D2M1:5，“熙宁通宝”，钱径2.6、穿2.6厘米。D2M1:6，出自陶罐内，为“大观通宝”，钱径2.5、穿2.5厘米。

铁钉 2件。形制相同。锈蚀呈红褐色。呈“7”字形，截面为长方形，下端尖。D2M1:3，长6.5厘米。

(二) 土墩出土遗物

陶碗 1件(D2①:4)。灰白胎硬陶。敞口，浅弧腹，平底。施青黄釉，已脱落。口径10.2、底径4.6、高4.2厘米(图3-12,1)。

陶钵 1件(D2①:5)。灰白胎硬陶。口微敛，深弧腹，平底略内凹。施青黄釉，已脱落。口径15.6、底径7.6、高5.6厘米。

陶釜 1件(D221:1)。夹砂灰黑色软陶。敞口，宽沿，深弧腹，最大腹径居中，圜底。底部有烟炱痕迹。口径22.4、腹径24、高14.8厘米(图3-12,2)。

陶网坠 1件(D2①:6)。一端残。灰白色胎，褐色陶衣。圆柱形，中部略粗，中间有穿孔。残长4.8、直径3.2厘米。

铜斧 1件(D2②:1)。锈蚀严重，呈铜绿色，胎发白。形体较小，六边形釜，略束腰，斧身上部有一圆形穿孔，弧刃。长6.8、刃宽4.2、釜宽4.4厘米(图3-12,3)。

砺石 3件。深灰色砂岩。不规则形或长条形。D2④:1，长条形，一面经打磨。长9.8、宽5.5、厚3.8厘米(图3-12,4)。



图3-12 D2土墩出土遗物

1. 陶碗(D2①:4) 2. 陶釜(D221:1) 3. 铜斧(D2②:1) 4. 砺石(D2④:1)

四、D1 发现遗物

有陶瓮 2 件，陶钵、碗、杯、网坠、铜斧各 1 件，疑为墓葬随葬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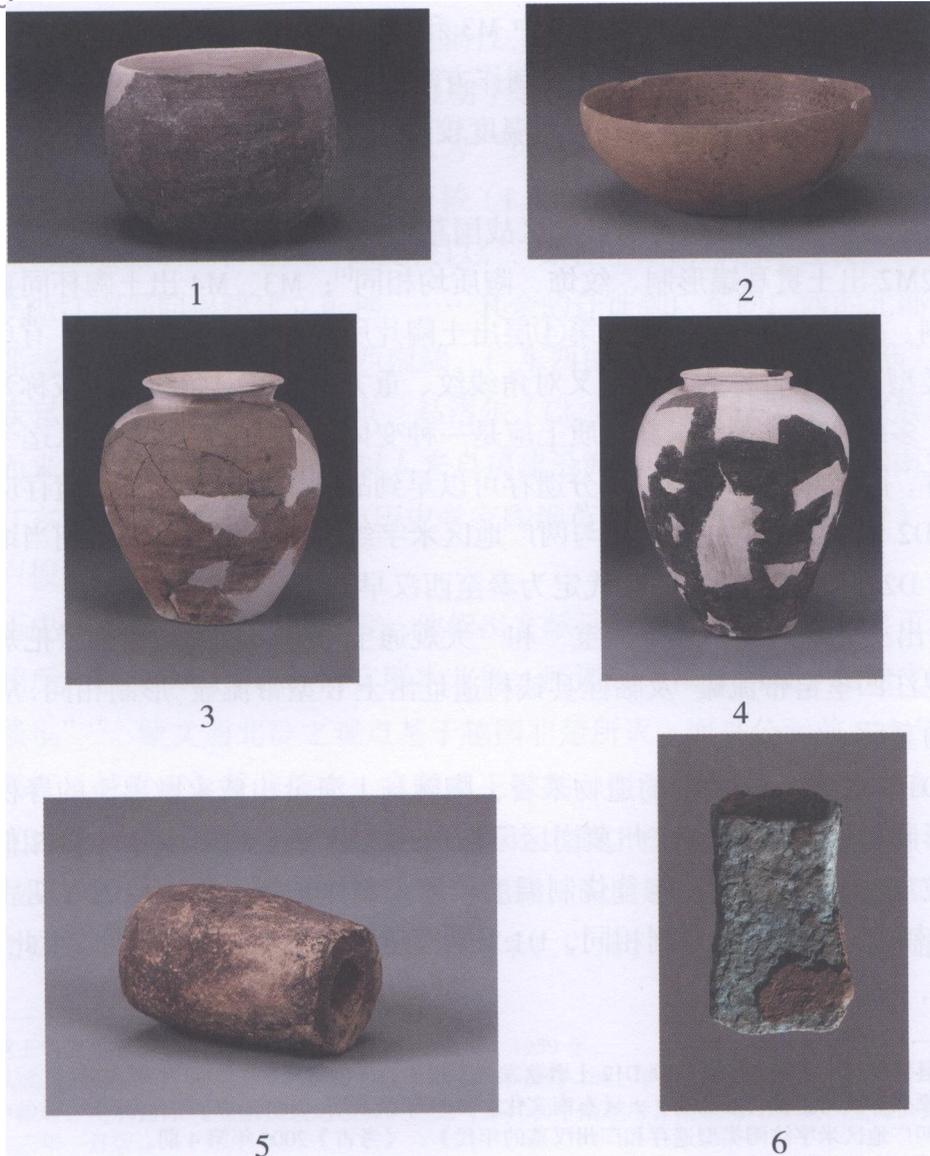


图 3-13 D1 出土器物

1. 陶杯(D1:1) 2. 陶碗(D1:2) 3. 陶瓮(D1:3) 4. 陶瓮(D1:4) 5. 陶网坠(D1:5) 6. 铜斧(D1:6)

陶碗 1 件(D1:2)。与 D2①:4 相似。硬陶，灰白胎。口微敛，弧腹，平底略内凹。内外施青黄釉，外部多已脱落。口径 10.3、底径 4.6、高 4 厘米（图 3-13, 1）。

陶杯 1 件(D1:1)。黑灰色硬陶。口微敛，垂腹，下腹弧收成小平底，底部有“《”形刻划符号。器内可见泥条盘筑痕迹。口径 7.4、底径 4.7、高 6.5 厘米（图 3-13, 2）。

陶瓮 2 件。D1:3，灰黄色硬陶。侈口，折沿，束颈，溜肩，鼓腹，最大腹径靠上，下腹内收成平底。通体饰方格纹。口径 18.6、腹径 32.2、底径 16.6、高 34 厘米（图 2-13, 3）。D1:4，形体较大。灰黑色硬陶。侈口，平沿，短竖颈，圆肩，鼓腹，下部弧收，平底内凹。口沿处旋刮两周凹槽，肩及上腹饰米字纹，下腹饰方格纹。口径 21、底径 16、高 43 厘米

(图 3-13, 4)。

陶网坠 1 件(D1:5)。形制与 D2①:6 同。长 4.2、径 2.9、内孔径 1.05 厘米(图 3-13, 5)。

铜斧 1 件(D1:6)。锈蚀严重, 呈铜绿色, 胎发白。形体较小。长方形釜, 束腰, 弧刃。长 4.5、刃宽 2.9、釜宽 2.4 厘米(图 3-13, 6)。

五、营造方式及年代

(一) 营造方式

D2 为一墩多墓结构, 选择此处较为平坦并略高的区域, 在早期建筑废弃堆积上铺设第④和③层作为垫土层, 形成比周围高且平坦的土台, 在土台中、南部开挖坑穴筑成 M2~M4。墩体上部已遭破坏, 墓穴原深度不明, 第③层之上及封土形制也不得而知。

(二) 年代

D2 处地层年代较为清晰, 第①、②层为近现代扰土层, 第③、④层为墩体的垫土层, 第④层出土的几何印纹硬陶, 其纹饰为岭南地区战国秦汉时期所常见, 第⑤层下虽有柱洞出现, 但因无伴出物, 故其所属年代不详。

D2 的 3 座早期墓葬形制相同, 其中 M3 和 M4 随葬器物均为陶瓮和杯组合。M2 仅出土陶甑 1 件, 其纹饰、陶色、陶质及制作方法同 M3 出土 AI 式陶杯一致。M4 出土器物, 胎质细腻厚重, 内外均施釉, 烧制温度较高, 制作更为规整精细, 年代应略晚, 但也相去不远, 可视为同期墓葬。

D2 随葬的陶甑和杯均可在浙江地区战国墓中找到原型, 其中 M2 出土陶甑同浙江安吉垅坝 D12M2 出土贯耳罐形制、纹饰、陶质均相同^[1]; M3、M4 出土陶杯同嘉兴地区的印纹陶形制、纹饰极为相近^[2]。D2 第④层出土陶片所饰的方框对角线纹, 有单框、双框和多框等类型, 有报告称为方格交叉对角线纹、重方格交叉对角线纹, 或称米字纹、双线米字纹、多线米字纹等等, 其实质上应是一种变体的米字纹。两广地区迄今所见的米字纹陶遗存, 除增城西瓜岭等一部分遗存可以早到战国晚期外, 大多数遗存应在秦或西汉早期^[3]。D2 的 M2~M4 的年代应与两广地区米字纹陶遗存相当, 考虑到当地文化发展的滞后性, D2 的 3 座早期墓的年代定为秦至西汉早期。

D2M1 出土北宋时期“熙宁通宝”和“大观通宝”各一枚, 所出陶带把短流罐和广西全州永岁江凹里窑带流罐^[4]及临桂县钱村遗址出土 B 型带流壶^[5]形制相同, 应为北宋晚期至南宋的墓葬。

至于 D1 的年代, 从发现的遗物来看, 陶碗与上海金山戚家墩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 III 式碗形制相近^[6]; 陶杯与广州萝岗区园岗山越人墓所出(M1:17) 十分相似, 这座墓葬的下限被定在秦汉之际^[7]; 陶瓮烧制温度较高, 制作精细, 为南越国时期后段常见, 瓮 D1:4 同南越王墓 I 型瓮形制相同, D1:3 同南越王墓 II 型瓮形制同^[8]。因此, D1 的年代较 D2 晚, 约为西汉中期。

-
- [1] 浙江省安吉县博物馆：《浙江安吉垅坝 D12 土墩墓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03 年第 3 期。
- [2] 陆耀华：《嘉兴印纹陶遗址与土墩墓》，《东南文化》1989 年第 6 期。
- [3] 李龙章：《两广地区米字纹陶类型遗存和广州汉墓的年代》，《考古》2006 年第 4 期。
- [4]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全州古窑址调查》，见《广西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4 年。
- [5] 桂林市文物工作队：《广西临桂县钱村遗址发掘简报》，见《广西考古文集（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6 年。
- [6]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市金山县戚家墩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3 年第 1 期。
- [7]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萝岗区园岗山越人墓发掘简报》，《华南考古》2，文物出版社 2008 年。
- [8]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 年。

第二节 双坟墩土墩墓与“越人南迁”

双坟墩土墩墓的发掘，对当地汉代考古的意义重大。在合浦历年发掘的 1000 多座汉墓中，尚无先秦及西汉早期墓的报告，本次发现，不但填补了当地文化发展序列中的缺环，而且对越族迁徙研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越人南迁”问题的提出

学者所谓楚灭越而越始南迁之说，多基于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的记载：“当楚威王之时，越北伐齐，齐威王使人说越王，……越遂释齐而伐楚。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1]。20 世纪 20 年代法国汉学家沙畹 (Édouard Émmanuel Chavannes) 最早认为“安南种族同建国于浙江北部而亡于公元前四世纪的越国应有关系”^[2]。稍后，鄂卢梭 (L. Aurousseau) 进一步阐述为“公元前 333 年楚灭越国，拓地至浙江，越人乃因此役以后，始往中国南海沿岸迁徙。……这些南迁的越人先在浙江南部同福建建立东越。……其余的迁徙到广东同广西的北部，也就是建立百越的那些部落。最远的到了广西南端、广东西南境、东京同安南北部”^[3]。一些研究越南民族起源的学者亦持相似观点，马洛尔 (Cl. Madrolle) 认为越南京族起源于中国越国南迁而来的居民，并推断这些越人来自福建沿海^[4]，芮逸夫亦认为越南京族“起源地当在浙江东南沿海一带”^[5]。越南历史学家陶维英编著的《越南古代史》一书，也大体同意鄂卢梭的看法^[6]。

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持反驳态度，他指出文献记载的“越人迁徙之迹可考者，与鄂卢梭之说相反，不仅未曾南迁，而实屡次北徙，所谓越人南迁西瓯、骆越之说，皆属臆度虚构之谈也”^[7]。蒙文通北徙之观点基于越国非楚所灭，而是公元前 222 年被秦所灭。他指出司马迁《越世家》并非信史，自楚威王败越，至秦始皇统一六国，越人活动之迹不绝。秦汉之世，越人屡次大批北迁，而无南走之事。杨宽也指出陶维英、鄂卢梭等关于越国被楚灭亡以后，越人不断沿海向南大迁移，先后建立了闽越、东瓯以至南越、西瓯、骆越之说是毫无根据的、虚构的。在越国未亡以前，东南沿海地区的百越早就存在，决非出于越国灭亡后向南大迁移的结果^[8]。清人黄以周则考证《越世家》把“楚威王败越”和“楚怀王亡越”混为一谈，有失实之处，不可谓信史，楚亡越应为楚怀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 306 年^[9]。李学勤^[10]、杨宽等人均赞同黄以周这一说法。

诚然，《越世家》存在疏漏谬误，但今古著者皆在所难免。越人南迁的时间节点或为楚怀王二十三年，至于东南沿海的百越民族，客观而言，在越灭亡之前早已存在，也是不争的事实，鄂卢梭所论确有失偏颇。不过，据此断言越人未曾南迁，或为言过其实。

以考古学的实证材料出发，佐以文献考据，应不失为探讨越人迁徙的可取之道。可喜的是，近年来福建、广西等地相继发现了土墩墓遗存，其形制及出土遗物大多与吴越地区

所见相同或相似，这为我们判断福建和华南地区发现的土墩墓的族属和源流提供了依据，也为越人南迁提供了有力证据。

二、广西发现的土墩墓类型及其族属

土墩墓是商周时期广泛流行于古代吴越地区的一种独特的墓葬形式，主要分布于今江苏南部、浙江大部及皖南部分地区。土墩墓最初指平地起封的熟土墩内无墓坑的墓葬，近二十年的发现表明，土墩墓内挖有土坑，其源头可上溯至崧泽文化，下限延至汉代^[11]。土墩内的墓穴，多为浅熟土坑，但也见部分墓坑较深，甚至打破生土者，有学者称之为“竖穴土墩墓”，年代较浅坑类型晚^[12]。广西发现的两处土墩墓遗存分属浅熟土坑和竖穴两类。合浦双坟墩的土墩墓属浅熟土坑类型，另一处桂平大塘城 M3001 属竖穴类型。

大塘城遗址位于桂平市浔旺乡大塘城村郁江沿岸。2006 年在对该遗址的发掘中，共发现汉墓 6 座，其中年代为西汉晚期的 M3001，地表有人工堆筑而成的椭圆形土墩，东西长 24.2、南北宽 20.3、残高 1.75 米。墩体分两层，墓葬叠压于第 1 层下，打破第 2 层和生土。墓葬构筑顺序为先堆筑第 2 层形成土墩，然后在土墩中开挖墓穴，填埋之后再起封，将土墩和封土融为一体，为一墩一墓结构。M3001 由墓道和墓室两部分组成，规模较大，墓道残长约 4.8、宽 3.3 米；墓室长 6.4、宽 4.66、深 1.96 米。墓道近墓室处的两侧有熟土台阶，台阶上各有两个对称的方坑，两坑分别相距 0.79 和 0.96 米，坑内有圆形朽柱，可能原为构筑墓葬的设施。墓室两侧及后壁夯筑熟土二层台，其上铺砌砾石，后壁台内还夹杂有砾石^[13]（图 3-14）。报告中指出其墓葬形式较独特，少量出土器物为两广所不见，称之为土坑墓，但从构筑方式来看，实则也为土墩墓。报告还指其构筑方式在两广地区仅见于罗泊湾一号墓，但我们认为二者是有明显区别的。罗泊湾一号墓的墓穴由两部分组成，先在地地下挖 2.4 米生土，后用板筑法在平地向上夯筑 3.9 米^[14]。

无论从筑造方式还是出土器物来看，广西发现的两处土墩墓都与江浙地区的土墩墓高度相似。双坟墩 D2 从构筑方式来看，为典型熟土浅坑墓。三座墓葬出土器物在吴越故地的土墩墓中均可找到原型，器物的形制、陶质、陶色及纹饰等均十分相似，大小也基本相同。如 M2 出土陶甑同浙江安吉垅坝战国墓 D12 M2 出土的甑（原报告称“贯耳罐”）^[15]相似，M3、M4 及 D1 的陶杯同嘉兴地区 [6]、垅坝 D12 M2 及上海金山戚家墩^[16]出土战国时期印纹硬陶杯形制相似（图二）。这些陶甑和杯属硬陶，烧成温度高，釉层均匀，远超当地的制作水平，应为越人迁徙时直接带来的。M3 和 M4 出土的敛口陶瓮，烧制温度很低，其形制同岭南地区战国秦汉常见的敞口硬陶瓮亦不同，应为越人在合浦当地仿制的。广西发现的同期战国至汉初的墓葬则呈现完全不同的文化面貌，如武鸣马头安等秧，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随葬器物多为铜实用兵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陶质的生活用具一般多为罐、釜、杯、钵，纹饰为岭南战国时期常见的方格纹、米字纹、水波纹和蓖点纹等^[17]，而双坟墩 D2 出土器物常见的细布纹或麻布纹则不见于广西同时期的墓葬。

大塘城 M3001 墓道底端近墓室处的两侧台阶上开对称方坑，坑内竖圆柱的构筑方式，在浙江安吉龙山战国墓 D141M1 墓道内亦有发现^[18]。M3001 出土陶器为岭南西汉晚期墓葬常见的瓮、罐组合，以汉式器为主，仅有 2 件越式器。其一为饰细布纹的小口鼓肩罐，口部虽残，仍可看出为直口，鼓腹丰肩，下腹斜收，和浙江安吉龙山战国晚期越墓 D141M1 陪葬坑出土的瓮和坛的形制、纹饰及陶质相近（图 3-15）。另一为报告称的“喇叭口卷沿罐”（M3001:9），小口，长颈，弧腹，平底，明显不同于当地所出器物，倒与浙江湖州汉代土墩墓中出土的 B 型平底壶器身形制相似^[19]。

因此，我们初步认为广西发现的土墩墓墓主为越人或其后裔。越人南迁至广西初，完全沿用土墩墓这一独特的墓葬形式，出土器物均为越式器，如双坟墩 D2。至略晚的西汉中期，双坟墩 D1 已随葬有岭南常见的几何形印纹硬陶敞口瓮。及至西汉晚期的大塘城 M3001，形制虽仍为土墩墓，但已结合了竖穴土坑墓的某些特征，随葬器物也已以汉式器为主，仅存少量越式器。究其原因，是越人迁居广西后，随着与本地居民的文化融合及汉化程度的逐渐加剧，土墩墓筑造方式虽一直有所沿用，然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都已发生较大的变化。

三、南迁路线及相关考古发现

历史上的每一次战争，往往会导致大量非正常的人口迁徙，楚越战争亦不应例外，考古学者关于两广地区出土器物的研究对此也多有涉及。刘波将两广地区地区东周时期青铜器分为长方釜斧钺群和椭圆釜斧钺群，并指出前者中部分青铜器的源头在长江下游的吴越地区^[20]，这可能是越人南迁的一个线索。郑小炉以吴越和百越地区出土的特色器物“镇”为例，说明越国败于楚后，使用“镇”的人群将其带到了广东西部地区，而非文化交流传入^[21]。他还进一步指出，在春秋晚期以后，尤其是战国中期以后，吴越地区越人有向岭南迁徙的过程。其迁徙路线主要有两条，其一为陆路，穿过浙江、江西，进入赣南山区，翻越五岭进入广东中部，进而扩展到其它地区；其二为水路，经由浙南、福建沿海进入广东、广西，这条路线应为主要途径^[22]。第二条线路的沿线还有其他土墩墓或土墩墓的线索发现。与浙南毗邻的福建省浦城县管九村，于 2005~2006 年发现了 33 个土墩，共清理 47 座墓葬，有一墩一墓和一墩多墓两种形式。依埋葬方式可分为平地掩埋、长方形浅坑、带墓道竖穴土（岩）坑三种类型。出土原始青瓷器、印纹陶器和铜器等 280 余件，年代多为西周至春秋时期。这是福建首次发现的土墩墓，填补了东南地区土墩墓分布的空白^[23]。从发表资料来看，应是与江浙土墩墓一脉相传。

广东的相关考古发现，过去可能曾被忽视。2003 年广州市萝岗区园岗山发现一座越人墓（编号 M1），为长方形竖穴石椁墓，两侧以大小不同的青石块砌筑椁壁，墓底自下而上依次铺土、木炭和小石子（图 3-16）。随葬器物除砾石外，均为陶器，有瓮、罐、杯和碗等，年代为战国晚期，其下限可至秦汉之际。报告指出其为典型的越人墓葬，是岭南首次发现的以石为椁的墓葬，其墓主人的族属应为百越之一的南越^[24]。值得注意的是，该墓砌

石框作椁，墓底铺垫小石子的做法与江苏宜兴潢潼^[25]所见的D1和D2石床石框型土墩墓一致，而铺垫土层、木炭及卵石或石块抬高墓底，又可防潮的做法见于浙江衢州、德清等地石床型土墩墓^[26]。园岗山M1出土的9件矮身、扁腹方格纹罐与宜兴潢潼D3出土网格纹罐形制相近，该类罐为江浙地区春秋战国土墩墓所常见；出土的敛口、鼓肩、下腹急收成平底 的盂(M1:4)与潢潼D1出土的盂形制相同，陶匜、杯和碗与浙江越墓的长青鼻子山M1和安吉龙山战国墓D141M1出土的平底盘、原始瓷小杯、原始瓷碗相像^[27]。尽管园岗山M1的上部已遭破坏，封土无存，但从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看，还是极有可能为南迁越人的土墩墓，其墓主人的族属可能并非南越。

越人南迁线路末端的越南北部地区虽未发现有土墩墓遗存，但亦不能排除其存在的可能性。1965年，越南国家博物馆在北部海防市附近的越溪(Vi \square t Khê)发掘5座墓葬，其中M2的年代为公元前3世纪，墓葬随葬大量铜器，除代表越南本地文化的东山铜鼓外，另随葬有越式鼎、壶、剑、矛等，作者指出其埋葬习俗同浙江崖墓一致，墓主应为南迁的越人贵族。楚败越后，墓主带领随从和家人移民至越南沿海地带^[28]。

综上所述，随着广西和福建土墩墓的相继发现以及对广州园岗山M1的重新认识，越人经由浙江南部、福建进入岭南甚至到达越南北部的这条南迁路线，正被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实，其移动轨迹也愈加清晰。沿线土墩墓的发现，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华南与东南沿海的交往已经比较密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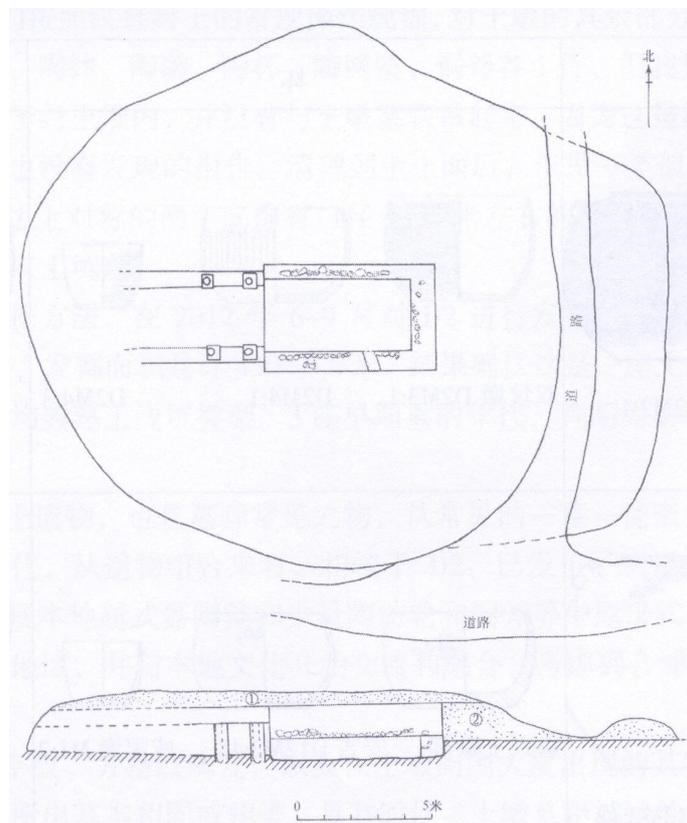


图 3-14 大塘城 M3001 平、剖面图

只供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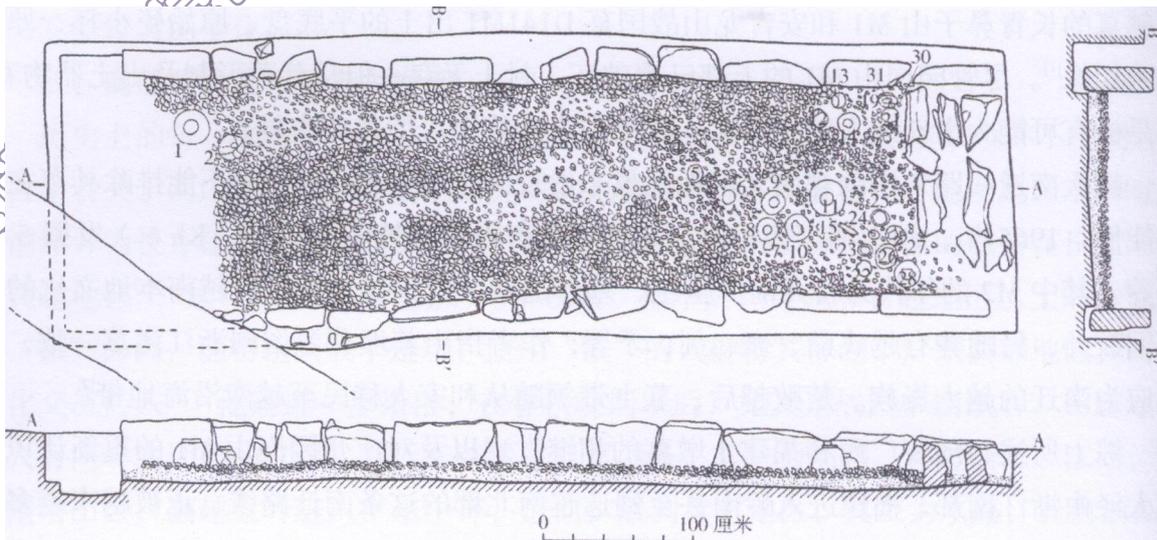


图 3-15 广州萝岗 M1 平、剖面图

| 器类 | 甗 | 杯 | 瓮 |
|------|----------------------|---|---------------------|
| 广西 | <p>双坟墩 D2M2:1</p> | <p>双坟墩 D2M3:1 D2M4:1 D2M4:3</p> | <p>大塘城 M3001:27</p> |
| 江浙地区 | <p>安吉垅坝 D12M2:42</p> | <p>嘉兴土墩墓 安吉 D12M2:48 戚家墩 M1:2</p> | <p>龙山 M10: 27</p> |

图 3-16 广西土墩墓与江浙土墩墓出土器物

-
- [1]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卷四十一第1751页，中华书局，1959年。
- [2] 转引自吴凤斌：《越南京族（越南族）族源初探》，《南洋问题》1982年第3期。
- [3] (法) 鄂卢梭著，冯承钧译：《安南民族之起源》，见《秦代初平南越考》附录第12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一月版。
- [4] 原文：马洛尔《古代北圻》，载《法国远东博古学院集刊》第37期，1933年法文版。转自陶维英《越南古代史》，第133页。
- [5] 芮逸夫：《中国民族与越南民族》，见《中越文化论集》(一)第124页，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6年。
- [6] 陶维英著，刘统文、予钺译：《越南古代史》第92~93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
- [7] 蒙文通：《越人迁徙考》，见《越史丛考》第29~39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
- [8] 杨宽：《关于越国灭亡年代的再商讨》，《江汉论坛》1991年第5期。
- [9] (清) 黄以周：《史记越世家补并辨》，见《傲季杂著》史说略，清光绪二十年，江苏南菁讲舍刻本。
- [10] 李学勤：《关于楚灭越的年代》，《江汉论坛》1985年07期。
- [11] 黄建秋：《江南土墩墓三题》，《东南文化》2011年第3期，P96。
- [12] 刘建国：《论土墩墓分期》，《东南文化》1989年第21期，P109。
- [13]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桂平市博物馆：《桂平大塘城遗址汉墓发掘报告》，见《广西考古文集(第四辑)》第213~254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 [14] 浙江省安吉县博物馆：《浙江安吉坵坝D12土墩墓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03年第3期。
- [15] 陆耀华：《嘉兴印纹陶遗址与土墩墓》，《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
- [16]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市金山县戚家墩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3年第1期。
- [17]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武鸣马头安等秧战国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 [1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越墓》第106~107页，科学出版社，2009年。
- [19]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湖州市方家山三号墩汉墓》，《考古》2002年第1期。
- [20] 刘波：《岭南地区东周青铜器分群研究》，《东方文明之韵—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
- [21] 郑小炉：《东南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的“镇”——古越族向岭南迁徙的一个例证》，《边疆考古研究》2003年00期。
- [22] 郑小炉：《吴越和百越地区周代青铜器研究》第236~237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 [23] 福建博物院、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福建浦城县管九村土墩墓群》，《考古》2007年第7期。
- [24]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萝岗区园岗山越人墓发掘简报》，《华南考古》2，文物出版社2008年。
- [25] 南京博物院，宜兴市文管会：《宜兴潢潼土墩墓群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06年第6期，P21-22。
- [26] a. 金华地区文管会：《浙江衢州西山西周土墩墓》，《考古》1984年第7期，P591-59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清县博物馆：《浙江德清县独仓山及南王山土墩墓发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10期，P46-58。
b.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越墓》第58页、第141-143页、第155-156页，科学出版社，2009年。
- [27] 同[22]，第58、141~143、155、156页。
- [28] Mari Lynn Larew. Thuc Ph á n, Gao Tong, and the Transfer of Military Technology in Third Century BC Vi è t Nam. EASTM 21 (2003) :20-21.

第三节 双坟墩土墩墓与大浪汉城址的时空关系

2002年9月~2003年4月，时广西文物工作队对大浪古城开展了第一次考古发掘。这次发掘，使我们对城址的年代和使用性质有了基本认识，之后投入了更多的人力物力，在城址周边开展拉网式调查，局部重点区域还进行了勘探，力图找出与城址相关的墓葬区。城址的西面临江，是宽阔的河流淤积，对岸也没有任何遗物的发现线索，所以在我们勘探排除城址南面和东面的台地之后，仅余北面的红花坎村民小组一带，这里的地表分布大量的几何印纹陶，北侧有两墩，村民传说为烽火台。我们则怀疑是汉墓的封土堆。

随后的勘探表明，两墩由熟土分层堆筑，在编号为D1土墩的进一步的探沟发掘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坑，该坑打破生土，出露了局部的转角，边缘齐整，显示人为加工的痕迹，我们最初判断是墓穴。于是，避开“墓穴”，对土墩进行四分之一解剖，没有更多的发现。最后我们按照汉墓封土的常规操作规程，对土墩的其余部分改由用机械施工，虽发现了陶瓮2件，陶钵、陶碗、陶杯、陶网坠、铜斧各1件，但我们当时认为是遗弃或因特殊葬俗而置于封土堆内，并没有与土墩墓联系起来，因为这是江浙一带吴越的葬俗，此前岭南地区也没有发现的报告。清理到生土面后，仅见一类似墓道的斜坡形状，往里有三个浅坑，边上对称的两个底部有口径40厘米左右的深洞。发掘结果出乎意料，并非原来判断的竖穴土坑墓。

我们调整了发掘方法，在2012年6~9月对D2进行发掘时，采用探方发掘，布5米×5米探方18个，发掘面积共计450平方米。结果确认这是一座土墩墓，内有1座宋墓和3座早期墓，均属熟土浅坑类型。3座早期墓的年代，判断为秦汉之际，墓主是南迁的吴越后裔。

反观D1的出土遗物，也是墓葬常见之物，从常见的一墓一瓮来分析，可能分属于两座墓葬。至于年代，从遗物组合来看，相较于D2，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除江浙越式器杯碗外，还出现本地越式器陶瓮和少量陶纺轮和铜斧等中原汉式器，表明这一时期汉文化已进入合浦地区，并与本地文化开始交流和融合，考虑到合浦当地发展的滞后，定为西汉中期。

D2出土的米字纹、方格纹陶瓮，以及在土墩周围大量出现的其它几何印纹硬陶，与大浪古城内发掘所出基本相同或相类，具共时性。土墩墓距城址约700米，与城址均分布在沿江一侧的红土台地上，两者之间分布有同期几何印纹陶，显示其连续性，加之墓葬与城址在功能上的互补，我们判断为同一聚落。

在这一聚落里，盛行土墩墓，多数尽管很可能在历史上已毁，目前发现数量很少，但可以表明，在这一聚落里，居住主要是汉化较早的吴越后裔，他们在秦汉之际南迁到这里，并在其后设郡县前后成为筑城的主力，也应是大浪汉城址附近居住的第一批居民。